

泰山之上何以镌刻着那么多“天书”密码

泰山碑刻天下闻名,其中有些碑刻平日里并不像秦刻石、唐摩崖那般声名显赫,它们静默地立于古寺颓垣、荒郊野岭之间,甚至在方志的角落里沉睡百年,那便是散落在岱宗南北、刻写着蒙古文、藏文、满文的古老石碑。然而,当我们将这些“天书”般的文字一一破译,一条各民族尊崇东岳、在文化血脉中深度交融的隐秘脉络,便赫然浮现于眼前。这不仅是泰山作为“天下之中”的又一段壮阔叙事,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石碑上留下的不朽烙印。



→ 灵岩寺天王殿旁的《大元国师法旨碑》

3

藏文“孤例”背后的雪域梵音

如果说八思巴文尚属元朝“国书”,那么灵岩寺天王殿旁的一方碑石,则直接将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与泰山文脉紧紧系在了一起。这便是著名的《大元国师法旨碑》。

此碑立于元至正元年(1341),碑面上半部是古奥的藏文,下半部是对译的汉文。元代尊奉藏传佛教,皇帝从萨迦派高僧中迎请“帝师”与“国师”,统领天下释教。国师发出的正式官方文书,即以藏文书写。近代法国汉学家沙畹最早注意到此碑,并请东方学家列维将部分藏文对译;当代藏学大家王尧先生后来将藏文全部译出,并指出这是“为元代正式的官方文献中使用藏文的仅见一例”。

这道法旨的内容,是国师对其在灵岩寺的属官、僧众下达的约束训诫。站在碑前,不难想象当年景象:身着赭红袈裟的藏僧,手持法旨,不远万里来到东土名刹,与峨冠博带的汉地僧官共理佛事。他们身后的这片山林,又是儒家“仁者乐山”的圣地和道教“蓬玄洞天”的仙乡。儒、释、道三家,汉、藏、蒙诸族,就这样在泰山脚下完成了罕见的文化叠压与共生。泰山,以它无言的厚重,容纳了来自世界屋脊的信仰力量。

4

满汉合璧的盛世华章

时光流转至清代,泰山又见证了另一段民族交融的佳话。步入岱庙大殿院落,在东侧台基之上,一方龟趺方首、碑面光洁如镜的巨大石碑格外引人注目。这便是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的《重修岱庙碑记》,俗称“满汉碑”。

乾隆皇帝御笔亲书,碑文共计三十六行:前十八行为规整的汉字楷书,后十八行为舒展的满文。两种文字内容完全一致,详细记述了朝廷拨帑重修岱庙的始末。这种“满汉合璧”的碑刻形式,并非简单的翻译对照,而是清朝“同文之治”政治理念的直观体现。

乾隆帝一生十一次登临泰山,或遣官致祭,他深知泰山在维系国家认同中的分量。这方石碑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清王朝在处理多民族事务时,既要保持满语作为国语的尊崇地位,又要借助汉语汉文来统合辽阔疆域与亿万臣民的政治智慧。光滑如镜的碑面之上,满洲的弓马之风与中原的文治之道,被一纸诏书、两行文字,镌刻成永恒的和谐。

从东平湖边的畏兀体残碑,到灵岩寺中的藏文法旨;从岱庙里的满汉合璧,到西南村寨中形态各异的石敢当——这些散布在泰山周边的金石遗存,恰如一部用多民族文字写就的“石头记”。它们告诉我们,一部中华文明史,从来不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独唱,而是多民族共同参与、声部丰富的交响。那些看似怪异难识的“天书”密码背后,隐藏着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、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。在那些青石与古字面前,我们读懂的,是一个古老文明博大的胸襟与漫长的守望。

据《齐鲁晚报》

1

元代靡宇中的畏兀体密码

在山东东平州城的故址深处,曾立有一方元代《重修靡宇记》碑。岁月剥蚀了碑上大部分汉文,却唯独留下两行奇特的文字——它们既非汉字,也不同于常见的蒙古文,字母纤细流畅,带着来自西域的风尘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党宝海经过辨识,确认这便是极为罕见的“畏兀体蒙古文”。

故事要从成吉思汗的时代说起。

彼时,蒙古草原尚无统一文字,政令传达全凭口传心记。一位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(即回鹘)智者,奉命以本民族的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言,创制出最早的蒙古文字,史称“畏兀体蒙古文”或“回鹘体蒙古文”。随着蒙古铁骑踏遍欧亚,这种文字一度通行于大蒙古国全境。然而,因其后来被忽必烈时期推行的八思巴文所取代,传世

的畏兀体碑刻寥若晨星。东平这方碑石上的两行残字,宛如历史长河中的两片落叶,见证了蒙古汗国早期行政文书的面貌,也无声诉说着山东这片土地曾经是沟通漠北与中原的咽喉要地。虽为残石,其价值却重若丘山,它是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,西域智慧与草原雄风在泰山脚下碰撞出的第一簇火花。

2

八思巴文的“官方认证”

如果说畏兀体文是历史的“遗珠”,那么在泰山周边发现的数方八思巴文碑石,则是元朝国祚赋予泰山的直接“官方认证”。

八思巴文,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“蒙古新字”,用以“译写一切文字”。在肥城布金山之阳,曾有一座《重修三皇庙碑》,立于元至大三年(1310),碑额上便是庄严的八思巴文。如今碑身已残,移存于颠仙祠内,但仅存的文字依然透露出元廷对华夏始祖医神的礼敬。

更为有趣的是一方立于宁阳的《至圣炳灵王庙碑》,元后至元六年(1340)立。碑额的设计别出心裁:汉字与八思

巴文并肩而立,分列左右,仿佛两位不同语言的使者共同守护着庙宇的神圣。碑文中的“至圣炳灵王”,正是泰山神——东岳大帝的尊号。元朝皇帝以当时最高规格的“国书”形式加封泰山神祇,意味着对于泰山信仰已经超越中原汉地的范畴,正式进入了由蒙元帝国主导的、囊括多民族文化的国家祀典序列。

此外,东平学宫旧址上的《东平学玺书碑》更是一件奇物。碑阳分为上下两截:上截是元成宗崇奉孔子的诏书,赫然以八思巴文书写;下截则是汉文正书的中书省榜文。一道圣旨,两种文字,朝廷尊儒重道的姿态在这方石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岱岳区夏张镇的旷

洞村(今玄家村),《吉祥寺令旨碑》分三层刻录了“马儿年”及延祐五年的晋王令旨,县志称其文为“蒙古语”,实为保护寺院土地财产的特许状。这说明,即便在乡野小寺,元朝的法令文书依然严格遵循着多语文书并行制度的规矩。

灵岩寺内还有两处极富禅意的八思巴文遗存。大殿西侧,延祐年间《灵岩寺执照碑》旁,有一段至正四年(1344)察罕普花书写的题刻,汉文与蒙古字各一行,内容是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“唵嘛呢叭弥吽”;五花殿东的石柱上,同样镌刻着八思巴文的六字真言。那盘旋升腾的笔画,仿佛将高原雪域的梵呗诵祷,融进了泰岱群峰的松涛之中。